

马来亚独立前后永春会馆职能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Yongchun Associations in Pre- and Post-Independence Malaya

郑名烈*

(TEE Beng Lee)

摘要

永春人为福建社群当中最大的次方言群，总人数达到七十万人，人数甚至超越海南、潮州、广西，以及兴化这些方言群。¹永春会馆为永春移民创建的重要社会组织。各地方的永春移民透过永春会馆把永春同乡凝聚在一起。民国初年，各地永春会馆之间仍缺乏互动，唯在中国永春发生匪祸之后，掀起新、马两地的永春移民展开救乡运动，各地方的永春会馆才有了连系。日本侵华期间，英属马来亚掀起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多个地方的永春会馆领导人投入筹赈运动，会馆的凝聚社群的力量达到历史高峰。马来亚独立后，顺应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国内华人社团出现整合潮，全国各地永春属会联合组织了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分散各地的永春社群再度整合在一起。本论文就马来西亚的永春会馆的分布地点、机能的演化进行比较说明，剖析会馆扮演角色的变化，藉此窥探华人会馆在社群扮演角色的变化。

关键词：永春社群、永春会馆、机能

Abstract

The Yongchun people are the largest sub-group of the Fujian dialect group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700,000, surpassing even the populations of other dialect groups such as Hainan, Chaozhou, Guangxi, and Xinghua. Regarding research on Chinese sub-dialect groups in Malaysia, previous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Yongchun community have reported typical findings. Yongchun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by early Yongchun settlers in various plac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uniting the community. Prior to Malaya's independence, there were littl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ssociations. It was only after Yongchun county became infested with bandits that salvation

* 郑名烈博士 华社研究中心公共联络主任兼研究员。电邮地址：teeaddy@yahoo.com.sg

¹ 根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00年发布马来西亚人口和住宅普查资料，福建人占了华人人人口总数的37.59%，客家人占了20.33%，广府人占了19.86%，排在第四位的潮州人仅占9.25%。永春人的人口占了福建人的三分之一。有关数据参见(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马来西亚华人>。游览日期：2016年10月23日。(2) 蔡维衍，2007，〈永春最新统计数据简介〉，《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movement organis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Yongchun settl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o help the people back home that these associations began to connec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in China set off a wave of support for their motherland among the Yongchun people in British Malaya and many leaders of Yongchun Associations from various places contributed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This period saw the associations demonstrated their ability to unite the Yongchun community at a level never before seen. Ami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s after Malaya became independent, many Chinese associations saw the need for further integration. In response, the Yongchun Associations then formed the Malayan Yongchun Federation, thus integrating the Yongchu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examines the lo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functions, followed by analysis on their changing rol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role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to the community.

Keywords: Yongchun community, Yongchun associations, function

前言

英殖民时期，中国移民在马来半岛以方言、地缘，以及血缘为纽带，在港口、矿区，以及森林的聚落聚居开展经济活动。随着人口的增加，不免在经商拓殖与生产活动出现竞争，社会开始变得复杂。同乡的互助变得日渐重要，在英殖民政府默许下逐步发展为帮群社会。每一个帮群在英殖民政府的半自治社会下，因应社会需要而建构了本身的社会组织。永春人为福建社群之下最大的次方言群，人数甚至超越一些方言群，就马来西亚次方言群的研究而言，永春社群的发展与变迁之个案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性。

目前，马来西亚的永春社群组织具有永春会馆、家族会组织、桃源俱乐部，以及坟山组织四大类。其中数目最多者为家族会组织和永春会馆，前者约40个，而后者已有29个。前者是单一宗族南来后再组织的血缘性组织，而后者则是地缘性组织，在整合永春社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过去针对永春会馆所做的研究还未对不同时段全国各地永春会馆的职能变化做比较。透过马来西亚最大次方言群会馆组织机能变化的研究，可藉此解析会馆角色之变迁，以及回应政治环境变化所做之调适。

有关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就单一永春会馆的研究，仅有《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²的其中一章讨论到吉隆坡永春会馆之创设经过。而公对永春社群在地方上的拓殖与社群建构的论述也不多见，《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探讨的是永春社群在一个地方拓殖扎根的经过，视角上是公冢对地方社群整合的作用。³本论文将不同地区的同一地缘性会馆的职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时也对独立前后时段永春会馆职能的变迁进行比较，藉此窥探华人地缘性组织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不同阶段职能的变化。

² 郑名烈，2014，《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³ 郑名烈，2013，《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一、历史最悠久的永春会馆创建时间的争议

马六甲永春会馆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永春社群的组织。有关其创建年份，目前存在1800年和1875年两个说法。马六甲永春会馆馆史记述道：“本会馆创馆于前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迄今已超逾两个世纪，是本邦最早成立会馆之一，盖因当时永春县丰山陈臣留乡人于清丁丑年（1757年）游贾马六甲，居颇有获利之后，遂引其族亲戚友数百人，相继到甲拓疆，后接踵纷至定居蕃殖者众，至1800年乡谊凝聚，创馆应缘兴焉。上述史迹，乃依据福建省志，永春县志内华侨志所载，依史可凭也”（马六甲永春会馆史略，2022）。但因马六甲永春会馆自创馆至修建年代（1800至1874年）期间，历任会馆主席和领导先贤的资料已不可考，故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会馆于1800年已经落成。

另外，《马六甲永春会馆史略》记载道：“本会馆于前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重修落成，屈指于兹已120周年矣。回顾馆迹依旧，人事全非，雕梁画栋，尽是先人遗业，继往开来，足堪就永春会馆而后昆式凭。昔在乡邑硕彦馆主李桂林暨董事陈宪章，因鉴于邑人梯航南渡拓疆，继而殖藩者众，散居而少联系，乃竭力纠之使众，唤之使从，由此立馆者舍以睦乡情，邑人贤达出钱出力，声气相投，守望相助，举凡有事诉之会馆，难题无不迎刃而解”（马六甲永春会馆 1995：5）。显示在李桂林与陈宪章（即陈明水）领导期间，南来者日渐增多，因散居各地联系不易，1875年才纠众立馆。由此可看出，有关1800年永春会馆已经存在的说法迄今仍然语焉不详。

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三宝山的永春籍坟墓的数量是另一项证明永春社群已经成形的参考依据。三宝山已发现最早的永春古墓创建年份为1774年（黄文斌 2013：122），1800年前永春籍的墓园仅出现有两座，⁴藉此可推测当时的永春人的人数仍然不多。到了1873年，三宝山才出现“永春公司义塚墓”。总坟的出现是一个社群存在的证据，由此显示十九世纪中叶已有一定数量的永春移民安葬在三宝山，其中不乏没有亲人与后代祭祀的孤魂（曾玲 2003：150）。值得注意的是，永春公司义塚墓的墓碑上的立墓者书的是“永春众兄弟同敬立”，而非以“永春会馆敬立”表示（黄文斌 2013：159-160）。显然，“永春会馆”在1873年应该还未正式成立。

值得关注的是，“永春公司”在当时是会党组织吗？或者属于秘密会社？麦留芳认为“公司”未必直接等同于会党，好比从结构上并未采纳天地会的秘密仪式或口令。再则，麦留芳认为会是帮会借用公司或会馆做外衣，使人误以为公司等于帮会。事实上，1869年危险社团法令颁布，主因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对秘密会社或会党逐渐失去控制，而会党也对社会治安造成威胁，而在1889年正式取缔秘密会社（颜清湟 1991：115）。另外，英殖民政府于1877年设立华民护卫司署，以达到全面控制为目的，并对会党展开取缔；地缘性组织和业缘性华团随之扮演协调与促进地方开发和担任华人社区指导机关的重要角色，各类华团如会馆、宗祠、公会等如雨后春笋涌现（麦留芳 1985：32、36-43、74-75）。十九世纪所建的华人会馆大多数是以“公司”命名，华人会馆逐步将名字由公司改为会馆的风潮始于二十世纪初期。例如雪兰莪永春会馆1892

⁴ 两座永春墓园的墓主分别为陈柔燕（1774）、吴门陈完娘（1783）。

年成立时期也称作“永春公司”，1912年翻建会所时才改名为“永春公所”。1928年，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受华民政务司看重，被委任处理同乡之间的纠纷（雪兰莪永春公所 1993：34）。这点说明了华民护卫司对会馆会务的影响。另外，雪兰莪福建会馆在1885年创馆时期，也以“福建公司”命名（雪兰莪福建会馆 2010：25），1926年建新馆时才改名为“福建会馆”。

值得注意的是，麦留芳认为原先许多“公司”开始转型为会馆。那些与秘密会社无关的乡团组织经甲会馆来“漂白”身分。而本来即是秘密会社的“公司”则借用了“会馆”来作护壳，掩饰秘密会社的真实身分。早期的华人公司有两大类：一是分担经费的殡仪组织。另一类是损益摊分的金融组织。早期移民设有不同方言组合的公司，以处理乡亲入土为安的善后。殖民地的会馆皆源自义冢组织等“公司”，又类似原乡民间的“银会”，即一般民间的互助会，会员可存钱入会，若有急事如医药丧葬，可献议愿付利息以接待，会员亦可从利率中得利（麦留芳 2017：30-31）。

笔者认为，1873年之前马六甲永春移民已经组织了“永春公司”，同时兼具协助乡亲入土为安殡葬事务与银会的机能。创建总坟是解决无后人祭祀的孤坟之外，也藉此创建社群共祖来凝聚社群。社群总坟设立后每年的春秋二祭，需要专门组织来张罗，永春公司即是这个组织。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马六甲日落洞义山。1884年创建的永春公司义冢由马六甲峇都安南（包括江沙七支）（Batu Berenam）、武吉峇汝（Bukit Baru）及答掉三个地区的永春同乡所建立。⁵1914年在麻坡武吉巴西镇（Bukit Pasir）的永德公冢的永德公司义冢即由双溪劳惹（Sungai Raya）和双溪直凹（Sungai Terap）的永春和德化乡亲合力创建（郑名烈 2013：42）。上述几个地方的永春移民通过永春公司、永德公司来处理同乡的殡葬事务。日落洞义山的永春公司和武吉巴西永德公司并没发展为永春会馆和永德会馆，而是转型为“马六甲日落洞永春义冢管理委员会”和“武吉巴西永德公冢理事会”。前者负责永春公司义冢这个总坟的祭祀工作，而后者则发展管理武吉巴西永德公冢的坟山组织。综合以上证据，马六甲永春会馆应是由“永春公司”转型而来，但“永春公司”成立的时间在何时仍待进一步考证。

《永春县志》记载祖籍永春桃城镇丰山村陈金声的祖父陈臣留于1757年到马六甲经商发迹，1800年创建了马六甲永春会馆（林源瑞 2010：172）。马六甲永春会馆一直也沿用这个说法来作为创馆历史的依据。但有关陈臣留的事迹留下记载的文献非常有限，笔者透过十九世纪末马六甲陈金声家族与永春会馆的互动事迹，发现永春公司于1800年由陈金声的祖父陈臣留所建的说法存在许多疑点。

陈金声于1847年回到马六甲担任青云亭亭主，至1864年去世后由其子陈明水（任期1864-1884）、陈明岩（任期1884-1893），以及其孙陈若淮（任期1895-1915）先后继任亭主职务。青云亭亭主在当时是马六甲华人社会最高领袖的职位，⁶与各会馆之间保

⁵ 经笔者查证，马六甲没有“答掉”这一个地名，笔者认为“答掉”应为“峇樟”（Bacang）的笔误。在地理上Bacang、Batu Berenam，以及Bukit Baru紧邻在一起，因此此处的“答掉”应是“峇樟”。另日落洞义山距三宝山仅有十公里，该义山亦有一座永春总坟。

⁶ 马六甲甲必丹制度在1825年宣告结束，由亭主制度所取代。亭主故成为如甲必丹一样赋有某些可施予本族人的执行权、行政权和若干司法权的间接管治。参见（麦留芳 1985：32）。

持密切的关系。倘若马六甲永春会馆于1800年由陈金声的祖父陈臣留所建，永春会馆应与陈金声家族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藉由陈金声家族的声望来提高永春会馆在马六甲华社的声誉。尤其陈金声于1847年至1864年担任青云亭亭主，按照常理应与永春会馆有所互动，但迄今却未发现陈金声参与永春会馆会务的任何证据。

陈金声家族对永春会馆会务参与的最早证据始于1875年永春会馆进行重建时期，时任青云亭亭主为陈金声的长子陈宪章（即陈明水）受邀担任永春会馆的大董事，这一段历史就被刻在永春会馆重修纪年碑（马六甲永春会馆 1995：39）。继陈宪章之后，1936年至1941年日军入侵之前，陈若淮之子陈思宗（即陈金声的曾孙）担任马六甲永春会馆的主席，这是陈金声家族和永春会馆关系最密切的时期。

综合上面多个角度分析，透过1873年创建的三宝山上“永春公司义冢墓的立墓者”为“永众兄弟同敬立”而不是“永春会馆”的线索，以及祖籍永春县丰山村的陈金声担任青云亭亭主期间（1847-1864）未留下与永春会馆互动的证据，由这两点来可推断马六甲永春会馆创立于1800年的说法有待商榷。

二、马来西亚永春会馆的分布状况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至2016年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29所永春会馆。其中东马有3所，西马共有26所，说明西马才是永春社群汇聚之处。全马闽南人目前总共创建了224所会馆。除了以福建行政边界作为整合组带的福建会馆之外，永春会馆是数量最多的地缘性组织。从表1的资料显示，在扣除95所福建会馆以外的其他129所福建籍地缘性组织当中，永春会馆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数量上居福建次方言群之首。数据资料也显示永春移民为福建人最早创建地缘性会馆的次方言群（即1875年重建的马六甲永春会馆）。

从表2资料显示，1875年马六甲永春会馆重建开始（马六甲永春会馆 1995：54），至2016年的一百四十年间全马各地总共创建了29所永春会馆，除了1900年至1909年，以及1970年至1979年两个时段未有新会馆出现之外，其他时段每隔十年均有永春会馆的创立，这样的持续性除了说明永春社群人口的增加之外，也显示永春社群经济条件的提升，有能力创建本身的社群组织。尤其在1920年至1929年期间，永春移民总共创建了8所会馆。同时也有4个桃源俱乐部与2个家族会组织的出现。⁷这时期是永春移民南来后最活跃的时期，分别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及霹雳等州属成立了社群整合机构。

1930年代虽然受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影响，但永春移民在这段期间仍然创建了4所会馆，分别为柔佛州的居銮和新文龙、彭亨的文冬和檳城。1940年代除了笨珍永春会馆与新文龙永春会馆在日军入侵前所成立之外，1941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所有会馆的会务皆停顿。而日军投降后百废待兴，元气大伤的华社处于复苏的阶段。这段期间有些会馆因条件许可就开始进行组织复兴工作，有些会馆则因领导层在日据时期惨遭杀害，缺乏有力人士出来领导，就此结束了会务。唯永春会馆因社群人口

⁷ 桃源俱乐部是永春社群的娱乐场所，成立初期仅供具备一定经济条件者入会。家族会是具同一祖源的后代所组成的血缘性组织，是永春原乡宗族到海外再组织的团体。

众多，经济实力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二战前创建的永春会馆均在日军走后走上复兴之路。

在独立建国之后，永春社群持续在创建永春会馆。吉兰丹州的哥打峇鲁、彭亨州关丹这两个东海岸城市因永春人陆续从西海岸移居而逐渐发展为社群，基于联络乡谊的需要而创建了永春会馆。到了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在沙巴州哥打京那峇鲁和斗湖的永春社群先后创立了永春会馆。当地的永春社群主要是建国后由西马迁徙而来，所从事经济活动以买卖棕油和种植油棕为主，通过业缘和地缘双重纽带凝聚了永春社群。

表1：马来西亚福建闽南籍地缘性组织⁸

	福建会馆	永春会馆	南安会馆	晋江会馆	安溪会馆	惠安会馆	同安金厦	漳泉会馆	云诏东	德化会馆	总数
1800-1849	1										1
1850-1879	3	1									4
1880-1889	4	1		1							6
1890-1899	5	3	1								9
1900-1909	3	0									3
1910-1919	2	1	2	1	1	1					8
1920-1929	11	8	2	2	1	2	3	1		2	32
1930-1939	6	4	1			4	1	3	1	1	21
1940-1949	4	2	1			2	4		2	1	16
1950-1959	14	2	1	1	2		2		1		23
1960-1969	19	2	1	3	1		2			1	29
1970-1979	6	0	1	5	1	2	1		1		17
1980-1989	7	1	5					9			22
1990-1999	6	1			6	1	1	1			16
2000-2016	4	3	3	1	1		3			2	17
总数	95	29	18	14	13	12	17	14	5	7	224

注：本表是根据廖文辉博士所进行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再重新查证各地永春会馆成立年份进行修证。廖博士的统计数据参见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北京：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2015年，页193-194。

以地区分布而言，永春会馆集中在西马的西海岸，从表2可看出柔佛州的永春会馆数量最多，总共有12所；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及沙巴次之，各别有3所；吉兰丹、檳城和马六甲各有1所。而玻璃市、吉打、登嘉楼及砂拉越是还未出现永春会馆的州属，

⁸ 根据廖文辉博士所进行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再重新查证各地永春会馆成立年份进行修证。廖博士的统计数据参见廖文辉：〈马来西亚闽南地缘会馆之统计与分析〉，《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北京：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2015年，页193-194。

主因是这些地方的永春社群人口较少，未具备创立会馆的条件。这些州属的永春人主要融入福建社群，凝聚在当地福建会馆之下。

在英殖民时期，中国移民处在半自治的社会里，创建会馆组织变成一种社会需要。因此，当永春社群人数不足以组织永春会馆时，就会设法透过“福建”这一个行政边界来做为结社的纽带，扩大社群整合范围来壮大社群力量。许多案例显示，因意识到单打独斗难以和其他方言群抗衡，共同整合在福建这行政边界的纽带变成社会需要。例如在吉隆坡、新山、关丹、哥打峇鲁、斗湖、哥打京那峇鲁等福建人属于非主流社群的地方，不同的福建省属社群很自然的选择融合在福建会馆底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之后，有条件的地方社群又从福建会馆分化出来组织本身的地缘性会馆，例如吉隆坡的永春会馆、安溪会馆，以及南安会馆等。

相反的，永春人在福建社群中占优势的城镇，永春会馆成立时间一般会早于福建会馆。例如麻坡、芙蓉、怡保的永春人在当地是福建社群当中最大的群体，十九世纪末就创建了永春会馆。⁹有些地方甚至在永春会馆创建之后就未再见福建会馆的出现。例如巴冬、柔河、瓜拉庇朥、纳闽、东甲、新加兰及新文龙等城镇。

表2：马来（西）亚永春会馆分布及成立年代

成立年份	柔佛	马六甲	森美兰	彭亨	雪兰莪	霹雳	檳城	吉兰丹	沙巴	总计
1870-1879		x								1
1880-1889	x									1
1890-1899			x		x				x	3
1900-1909										0
1910-1919			x							1
1920-1929	xxx		x		xx	xx				8
1930-1939	xx			x			x			4
1940-1949	xx									2
1950-1959	xx									2
1960-1969				x				x		2
1970-1979										0
1980-1989						x				1
1990-1999									x	1
2000-2016	x				x				x	3
总计	11	1	3	2	4	3	1	1	3	29

注：纳闽原属沙巴管辖，1984年才划归中央政府直辖区，此处将纳闽永春会馆纳入沙巴州范围。吉隆坡在1974年脱离雪兰莪，由中央政府管辖。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⁹ 巴生的雪兰莪永春会馆成立于1892年，略比巴生福建会馆成立时间（1885年）迟一些，唯永春会馆在地方的影响力不亚于福建会馆，甚至和福建会馆轮流管理巴生福建义山。1920年成立的巴生树胶公会，发起者和领导人主要来自当地永春会馆。

三、二战前永春会馆的组成结构与功能

在民国时期，永春仍是个农业社会，除了在桃溪流经的几个乡镇如五里街、东平镇、东关镇、石鼓及岵山等地方的渡口，附近的居民从事与商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之外，永春其他乡镇的人民绝大部分是农民，尤其是远离县城的周边乡区，家家户户世代均以耕作为生。整体而言，永春社群经商的比例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¹⁰来到英属马来亚的永春移民离乡前大部分是农民，这些人到了马来半岛仍然继续依靠劳力谋生，其中不乏投入森林开发的拓殖活动，为马来亚树胶业急速发展的生力军。而原先在永春具有经商经验者，南来后继续通过商业买卖活动营生，逐步建构本身的商业网络。

会馆的创建与维系，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才能支撑下去。根据各地方永春会馆创建者的背景资料显示，大部分都是经商有成者。因此，商人阶级对永春会馆的创建与运作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商人阶层重视乡情，不吝于作出捐献，同时又因热心领导乡众而奠定了社会地位，因而在号召乡众加入会馆时就具有影响力。简言之，永春会馆的结构是由商人阶级与劳力阶级共同组成，只是居领导控制权的商人阶级占总人口很小的比率，底层的成员绝大部分是胶农与劳工阶级。¹¹

英殖民政府统治时期，华人的方言组织、宗亲会组织具有为新客安排居所、介绍工作，以及资助年老同乡返乡与亲人团聚的社会机能。除此之外，会馆还拥有宗教、福利、仲裁，乃至开办私塾教育同乡子弟的职能。笔者针对二战前19所地方永春会馆的职能进行梳理。归结起来，独立前永春会馆的重要职能如下：

- (1) 作为民间信仰祭祀神明的场所；
- (2) 提供南来者暂时住宿的方便；
- (3) 为南来的同乡介绍工作；
- (4) 解决同乡子弟接受教育的问题；
- (5) 创建坟山与协助同乡处理殡葬事务。

宗教活动为二十世纪前永春移民最为重视的社群活动。调查资料显示，森美兰、麻坡、巴冬、雪兰莪、纳闽及马六甲等地方的永春会馆均在馆内安奉祖籍地的地方神明——法主公。在华人庙宇仍未普遍出现时期，会馆同时兼具庙宇的功能，满足了永春移民祭祀神明的精神需求。

在移民之前，民间信仰在农耕社会本来就是重要的精神寄托。南来之后面对陌生和变幻莫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国移民需要从所熟悉的祖籍神明那里获取精神力量与慰藉（曾玲 2003：212-213）。对于离乡背井的中国移民而言，神明能够为家乡的亲戚祈福，保佑自己在异乡的事业顺利。就会馆本身而言，在馆内举行民间信仰的活

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籍贯因受职业影响而在就业形态有所差异。例如吉隆坡惠州会馆和广肇会馆的创会领导层就以大矿家居多，底部成员则以矿工为主。

¹¹ 在马来亚独立前，华人社群的职业结构营商者仅占少数，主因是社会缺乏资本，大部分中国移民都是农民出身，到马来亚后只能投身采锡和拓殖的粗活。商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在百分之十以下。

动也有助于提高会员们对会馆的向心力，同时也保存传统民间信仰的仪轨与文化。因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大部分会馆同时都兼具庙宇的机能，藉由宗教来发挥社团的功能。另外，英属马来亚政府规定，凡是崇祀神明的寺院均不必缴纳房地捐税，许多会馆每年因此节省了不少税金（李亦园 1970：93）。

表3：二战前永春会馆的职能

序号	会馆	职能						
		创立年份	祭祀神明	暂宿	引介工作	办学	创建坟山	协助丧葬
1	马六甲永春会馆	1875*	x	x	x	x	x	x
2	纳闽永春会馆	1890	x	x	x			x
3	雪兰莪永春会馆	1892	x	x	x	x		
4	巴冬永春会馆	1892**	x	x	x	x	x	
5	麻坡永春会馆	1894	x	x	x	x		
6	森美兰永春会馆	1895	x	x	x	x		
7	瓜拉庇劳永春会馆	1910		x	x	x		
8	峇株巴辖永春会馆	1920		x	x		x	
9	柔河永春会馆	1922		x	x	x		
10	丹絨马林永春会馆	1922		x	x			
11	吉隆坡永春会馆	1924		x	x	x		
12	新山永德会馆***	1925		x	x			
13	霹雳永春会馆	1925		x	x	x		
14	东甲永春会馆	1925		x	x	x		
15	文冬永春会馆	1930		x	x	x		
16	北马永春会馆	1932		x	x			
17	居銮永春会馆	1939		x	x			
18	新文龙永春会馆	1939		x				
19	笨珍永春会馆	1941		x				

注：* 马六甲永春会馆建馆时间具有1800年和1875年两个说法。

** 巴冬永春会馆创建时间有1882年和1892年两个说法。

*** 新山永德会馆为当地永春和德化两社群共同成立。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永春社群志》，2016，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早期的永春会馆一般具有为新到的同乡安排落脚处与寻找工作的职能。巴冬永春会馆一开始即成为南来北往或由唐山南来新客的驿站，提供出门在外的同乡歇脚之地，继而为他们寻找族亲安排住宿与工作。会馆提供必要性的支持，对华工移民南来开疆拓土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2016：64）。永春移民自十九世纪末就开始掀起南来的移民潮，并且集中涌向巴生、麻坡、马六甲等城镇，这与当地已经建立了永春会馆有一定的关系。乡族的网络为新移民解决了落脚处和就业的问题，扫除了

移居马来亚的最大障碍。例如新山永德会馆就为远地会员或亲友到新山做买卖时免费提供住宿，并且订定留宿的条例（新山永德会馆 2009：41）：

- （1）会员介绍亲友留宿，每次应有字据。或亲莅签名于登记簿之下。
- （2）远地会员寄宿，每天应签名于登记簿上，以备查考。留宿期限，在一个月內，介绍同一亲友留宿房间，规定以三天为限，远地会员因故寄宿。日期无限制；但本坡有职业者例外。
- （3）凡欲来寄宿，请勿迟过晚上十二时，以免看守人之不便。

在麻坡经商的永春移民在李庆烈的带领下于1894年创立了麻坡永春会馆（麻坡永春会馆 1984：63），为永春移民建立了一个立足点，给予南来的永春移民到麻坡时提供了落脚处，并且替这些新客们介绍工作。永春移民以不畏艰苦投入打芭粗活闻名，在同乡之间相互支持下，1910年至1920年之间大量永春移民涌入麻坡种植树胶，1920年后即控制了麻坡的树胶业，取代潮州人进入了麻坡华社的领导核心（李亦园 1970：76）。

同乡人口日渐增多以后，就面对了同乡子弟受教育的需求。由于英殖民政府未开办华文学校，中国移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办理私塾来教育同乡子弟。二战前绝大多数的永春会馆都从中国请来塾师开办私塾。例如麻坡永春会馆即由永春请来颜逢梯和郑亲绣来主持永春私塾（麻坡永春会馆 1984：63）。永春移民因南来人口众多，同时因在树胶业经营有成，因而在经济上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教育事业，参与办学的案例自然较其他籍贯者来得多。

创建坟山因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同时必须配合和在地的社会情境，因而仅有少数财力雄厚的会馆才有能力完成创建坟山的任务。迄今拥有本身所属坟山的永春会馆仅有马六甲、巴冬及峇株巴辖三个地方的永春会馆。大多数地方的永春社群是整合在福建会馆的框架下参与坟山的创建。

在专业的殡葬服务仍未普及化时期，华人社会的丧礼高度依赖会馆来处理。由于殡葬服务是一种硬性的社会需要，为免日后本身亲属遭遇身故时面对找不到人手帮忙的窘境，一般华人都会选择加入会馆组织。为已故的同乡提供殡葬服务是会馆的另一个重要职能。从到丧府搭棚、搭炉灶、调度“火头军”，¹²为故去者安排葬地、做法事、到丧府赶制服丧衣着、在丧礼期间负责招待前来吊唁的亲友，出殡时抬棺及锣鼓队人手的调度，会馆的福利组均有一套完整的作业系统。笔者从巴生雪兰莪永春会馆中发现，在独立初期，处理会员们的殡葬事务是会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该会馆甚至还号召全体会员合力购置大卡车作为出殡运载棺木之用途。

二战前永春会馆亦具有保护会员的利益与仲裁的机能。会员之间发生争端，或会员的遗产安排等事务，会馆就会启动仲裁的职能或展开协调工作。若会员在外与其他帮群成员发生争执，会馆领导层也会出面与对方的会馆进行谈判。会馆领袖经常也具有秘密会社领袖的身分，才有能力在龙蟠虎踞的地方华人社会保护会员的权益。在复杂的华人帮群社会底下，没有会馆做靠山的中国移民很难在地方上立足。例如在巴生，帮群之间常因争地盘而发生械斗，会馆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凝聚同乡创建会馆是为了团结众人之力争取生存空间。“商业竞争非团体不足以制胜。人才涣散非联络不足

¹² 原为军队中当炊事人员，在马来西亚闽南社群即指在婚丧喜庆掌控炊事的领导人。

图存，此固晚近潮流之所趋”，¹³说明了社会的竞争迫使中国移民必须设法凝聚社群的力量。整体而言，会馆的成立是一种社会需要，一种缅怀乡情的产物，同时也是社群经济实力的体现。

四、独立后永春会馆运作方式的转变与领导层特质的变化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移民活动也随之终止。仅有少数能够证明在海外有资产者或直属亲属者才获准离境。例如笔者的曾祖母于1954年离开永春来到马来亚和子女会合。这时期的会馆基本上不再提供同乡们的暂宿与介绍工作的职能。此外，因办学的工作已移交由政府主导，原先由会馆开办的学校已转由政府负责管理。独立后，民间神明信仰的普及化加速了庙宇的发展，会馆的宗教职能无形中被庙宇所取代，原有在会馆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不再像英殖民时期般热络，有些会馆甚至将原先安奉的神明转移至庙宇供奉。例如雪兰莪永春会馆的法主公被移驾到巴生五条路观音庙让社会大众供奉（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2016：63）。此外，独立后因政府颁布的法令逐步完善化，原先会馆的仲裁职能逐渐被法庭所取代，会馆因职能的变化而开始转型。

五一三事件以后政府政策实施出现偏颇，让华人社会明显感觉沦为二等公民。此时，华人社会从中国移居者在国家认同上基本上已经转向，不再将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当然，当时的政治情境已不允许华人公开表达对中国的国家认同。¹⁴即使华人社会已经宣示效忠于马来亚，但马来政治精英却为巩固本身的政治地位而持续渲染马来沙文主义。面对马来激进分子不断发出刺激华人社会的挑衅言论，华人社会除了在政治上做出适度的抗争之外，也积极推动华人乡团组织的整合。这时期华人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促使会馆职能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各地方会馆为了吸引年轻会员的参与而致力于推展凝聚社群的活动，积极推进会馆的转型。

会馆的转型主要显现在活动性质的转变，由独立前的照顾同乡利益转向联络乡谊。笔者就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各地方永春会馆举办的活动进行调查，经济条件较殷实的永春会馆推动系列的活动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其中麻坡永春会馆（1967年）、昔加末永春会馆（1969年）、峇株巴辖永春会馆（1978年）先后耗费巨资成立军铜乐队。在缺乏娱乐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项举措被喻为会馆吸引年轻人加入会馆的秘密武器。¹⁵军铜乐队的成员穿着漂亮的制服在大庭广众面前表演，威风凛凛的英姿迎来喝彩，对青少年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¹³ 吉隆坡永春会馆纪念碑文并序，目前放置在吉隆坡永春会馆顶楼大厅内部。

¹⁴ 自独立至今虽然已超过一甲子时间，但马来社会激进分子仍然会发出“华人返回唐山论”来质疑华人社会对国家的忠诚度。

¹⁵ 昔加坡永春会馆名誉顾问刘清分州议员在率领该会馆军铜乐队访问新山永德会馆时表示，会馆的军铜乐队组织是吸引年轻人加入会馆参与活动的秘密武器。参见〈柔佛人版〉，《中国报》，2017年12月7日。

马六甲、麻坡、昔加末及峇株巴辖的永春会馆也因为军铜乐队的设立，经常受邀在大型庆典与富有人家的出殡仪式上演出，在增加会馆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会馆的声誉。设立军铜乐队，也为会馆成立青年团创造了条件。上述三个会馆的青年团创立时间均与军铜乐队成立处在同一阶段即是最好的证明。

体育活动为马来西亚时期永春会馆的重点活动之一。自1975年永春联合会青年团成立以来，即开始主办两年一届的丹斯里李延年博士杯男女乒乓锦标赛，号召全国各地永春会馆派员参与，让乒乓发展为全国各地永春会馆共通性的活动。也因为各个属会轮流主办，无形中对永春社群强化了凝聚作用，数十年下来仍然持续在举办。在国内赛事匮乏的上世纪，永春会馆的这项赛事为马来西亚的乒乓运动的推广做出不少贡献，成为国内选手练兵的重要赛事，全国乒乓冠军与亚洲十六强选手郑东琦一直是赛会的常客。

当然，因所具备条件不同，个别会馆之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举办的活动也有差异。例如经济条件与人文环境较为优越的吉隆坡永春会馆就设置了合唱团、话剧组、舞蹈组、弦乐组，以及象棋队等小组，提供会员参与活动。但在经济条件较薄弱的乡区永春会馆，则未必能够集结足够的同好者共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永春会馆举办了开放给全体华社在籍学生参与的干训营和各类学艺比赛（如演讲和歌唱比赛），活动内容不仅趋向年轻化，并且逐渐突破以永春社群为本位的思维。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国性的永春社群的固定活动有永青杯乒乓赛、青年领袖干训营、汽车越野寻宝比赛，活动性质走向关心时事、益智、趣味化成为新生代领导下的趋势。一些永春会馆不遗余力在推动白鹤拳课程，特地从中国永春县聘请师傅到马来西亚教学。另外，吉隆坡永春会馆投入巨资请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进行历史研究，于2014年出版了《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郑名烈，2014），并且在推动会务与文史资料数码化专案，引领会馆走向现代化，为其他永春会馆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在永联会主催下，与中国永春县政府合办的冬令营和夏令营，已成为近年来青少年热烈响应的跨国活动。这些让年轻子弟远赴中国祖籍地永春县学习中华文化，以及溯源寻根祭祖的活动，对于培养年轻一辈的籍贯意识产生了积极作用。

独立后，基本例行活动方面大部分永春会馆只保留会馆的周年庆，较活跃的会馆也会举办新春团拜、端午节、中秋节和冬至等传统节庆庆祝活动。虽然办活动的目的围绕在联络乡谊，但这些节庆承载着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例如新春团拜同时也是对年长者施赠红包的敬老活动，蕴含宣扬孝道的用意。每年颁发会员子女成绩优良奖励金则是所有永春人重视教育的体现。

马来亚独立后华人在政治上已经被严重分化，对于许多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而又要建立社会地位者，乡团、宗亲会的领导人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因而成为许多成功商人在社会立足的途径。

表4：马来亚独立后永春会馆的活动推展

序号	会馆	活动内容					
		武术	补习	舞蹈	铜乐	羽球	乒乓
1	马六甲永春会馆				X		X
2	雪兰莪永春会馆						X
3	巴冬永春会馆					X	X
4	麻坡永春会馆						X
5	峇株巴辖永春会馆				X		X
6	吉隆坡永春会馆			X			X
7	东甲永春会馆				X		X
8	昔加末永春会馆				X		X
9	沙巴永春会馆			X			
10	新邦令金永春会馆	X	X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永春社群志》，2016，吉隆坡：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图表制作者：郑名烈

会馆提供了商人阶级超越政治的平台，透过会馆组织不仅能够与朝野政治领袖保持联系，在必要时刻为华社关心的议题传达心声，同时具有经商拓展事业的便利性，在与全国各地的同一社群领袖整合在同一社群边界的同时，也拓展了个人的人脉。不论是独立前成立或近期成立者，担任领导者都具有以下特质：¹⁶

- (1) 财力雄厚；
- (2) 勇于担当，具服务热诚；
- (3) 重视乡情，具强烈的籍贯意识者；
- (4) 透过社团平台拓展经商网络。

对于华社的中下阶层社会而言，他们也需要这些财力基础雄厚、又重视乡情的成功人士来领导社群组织。在供需因素的催化之下，马来西亚成立后，华人社团组织的数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地缘、业缘、学缘、宗教等类别的全国性整合组织也纷纷成立。

在马来亚独立前，华人社会存在着一些行业由特定方言群或次方言群垄断的情形。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地缘的纽带与业缘的边界具有高度的重叠性。颜清湟认为，天然环境、移民先后秩序，以及行业职业化的延续性，制约和决定了早期中国移民所从事的行业。此外，方言组织和宗亲组织能够保护同乡在行业中的利益，因而巩固了特定方言群或次方言群在某个领域的统治程度（颜清湟 1991：110）。独立后，在永春联合会成立初期，许多地方上永春会馆领导人亦是下游树胶商或大园主。进入马来西亚成立阶段，永春联合会除了是来自全国各地永春会馆领袖的汇聚的平台之外，同时也是树胶公会下的“同业”关系。马来西亚中上游的树胶商行主要由吉隆坡的永春社

¹⁶ 与十九世纪新马一代的方言组织选择领导人需考虑个人财产、超凡气质、教育程度、魅力等条件基本上相似，参见（颜清湟 1991：51）（转引自杨进发：《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华族领导层》，收在《新社学报》，第1卷，1967年12月，英文版，页6-12）。

群所掌控。1960年代，吉隆坡、雪兰莪及彭亨树胶商会，永春籍的会员占了大多数，其中李延年、郑棣担任多届会长，此二者也是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的创会会长与财政。对于永春社群领袖而言，树胶产业链是将大家汇聚在一起的动力源所在。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进阶到油棕业、制造业、服务业及建筑业等多元化领域。社团的领导人由原先经营树胶业者居多的局面，转变为多元化的领域。在永春联合会第二十八届董事会当中，具有特许会计师资格者不下五位、律师多达十位、发展商也有十余位（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2013）。

永春联合会成为各地方永春社群领袖重要的社交平台，为个人的事业拓展搭建联系网络。笔者认为，当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由农业逐渐转型为工商业之后，随着社团组织的传统职能被政府所取代，社团的职能已逐步呈现俱乐部化的特点。通过会馆会务的参与，原本不相识的会员相互认识后很快就发展为彼此的人脉。对于全国性联合总会而言，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属会的代表之间的交际，其个人商业网络关系拓展的意义更甚于会馆之间关系的建立。此外，具有全国总会领导层的身份，又可藉此建立跨国乡团组织的交流平台，拓展个人的国际商业网络。乡团世界总会组织的成立，提高个人声望之余，同时也为个人到中国经商通道建立了便利性。以福建社团联合会总会长的身份为例，到了中国经商的便利性远远超过没有任何背景身分的平民百姓。因此，乡团组织的领导位子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迎来竞争的局面。

结语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组织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主观意愿而言，从闽粤不同地区到来的中国移民，因语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造成沟通的障碍。来自同一地区的中国移民依据情境需要，通过建立方言组织、地缘性会馆、俱乐部、坟山组织，甚至创设祖籍地神明来凝聚同乡，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英殖民政府允许华人社团成立，一方面是以华制华策略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促使华人社会内部出现竞争关系，以达到分化华人社群的目的，全然是出自英殖民政府要操控华人社会的政治需要。

永春会馆是永春社群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在独立前已发挥了照顾南来的同乡、协助同乡们解决就业需要的机能。但在独立后，会馆的职能逐渐由政府所取代，永春会馆的职能转向联络乡谊，但仍然能够通过适合时代需要而设计的活动来整合同乡。

永春会馆承载了永春社群的集体记忆，肩负让土生土长的永春子弟亦能够维系籍贯认同的任务。但会馆的活动不能一成不变，反之需走在时代前面。保存会馆历史是每一个会馆必须承担的职责，结合科技将会馆文史资料数码化，有助于吸引年轻人参与会务，协助会馆转型。

参考文献

- 蔡维衍, 2007, 〈永春最新统计数据简介〉,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 曾玲, 2003, 《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 黄文斌, 2013, 《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李亦园, 1970, 《一个移殖的小镇: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林源瑞, 2010, 《漫谈古城老街谈故事》(上集), 马六甲: 罗印务(马)有限公司。
- 刘崇汉, 2016,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吉隆坡: 马来西亚嘉应属会联合会。
- 《麻坡永春会馆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1984, 麻坡: 麻坡永春会馆。
- 《马六甲永春会馆重修百廿周年纪念特刊》, 1995, 马六甲: 马六甲永春会馆。
- 《马六甲永春会馆史略》, 2022, 马六甲永春会馆网, <https://engchoonmlk.gbs2u.com/m-about/m-about1> (游览日期: 2022年7月6日)。
-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第廿八届董事手册》, 2013, 吉隆坡: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 《马来西亚永春社群志》, 2016, 吉隆坡: 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 麦留芳, 2017, 《百年虚拟帮会》,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麦留芳著、张清江译, 1985, 《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 台北: 正中书局。
- 《新山永德会馆庆祝85周年纪念特刊》, 2009, 新山: 新山永德会馆。
- 《雪兰莪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 2010, 吉隆坡: 雪兰莪福建会馆。
- 《雪兰莪永春公所一百周年纪念特刊》, 1993, 巴生: 雪兰莪永春公所。
- 颜清煌著, 粟明鲜、陆宇生、梁瑞平、蒋刚译,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郑名烈, 2013, 《拓荒·扎根: 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郑名烈, 2014, 《海外桃源: 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